

R
emember

记忆

林贤治 章德宁 主编

4 中国工人出版社

REMEMBER



REMEMBER

记忆

林贤治 章德宁 主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

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记忆. 第4辑/林贤治, 章德宁主编. -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2.1

ISBN 7-5008-271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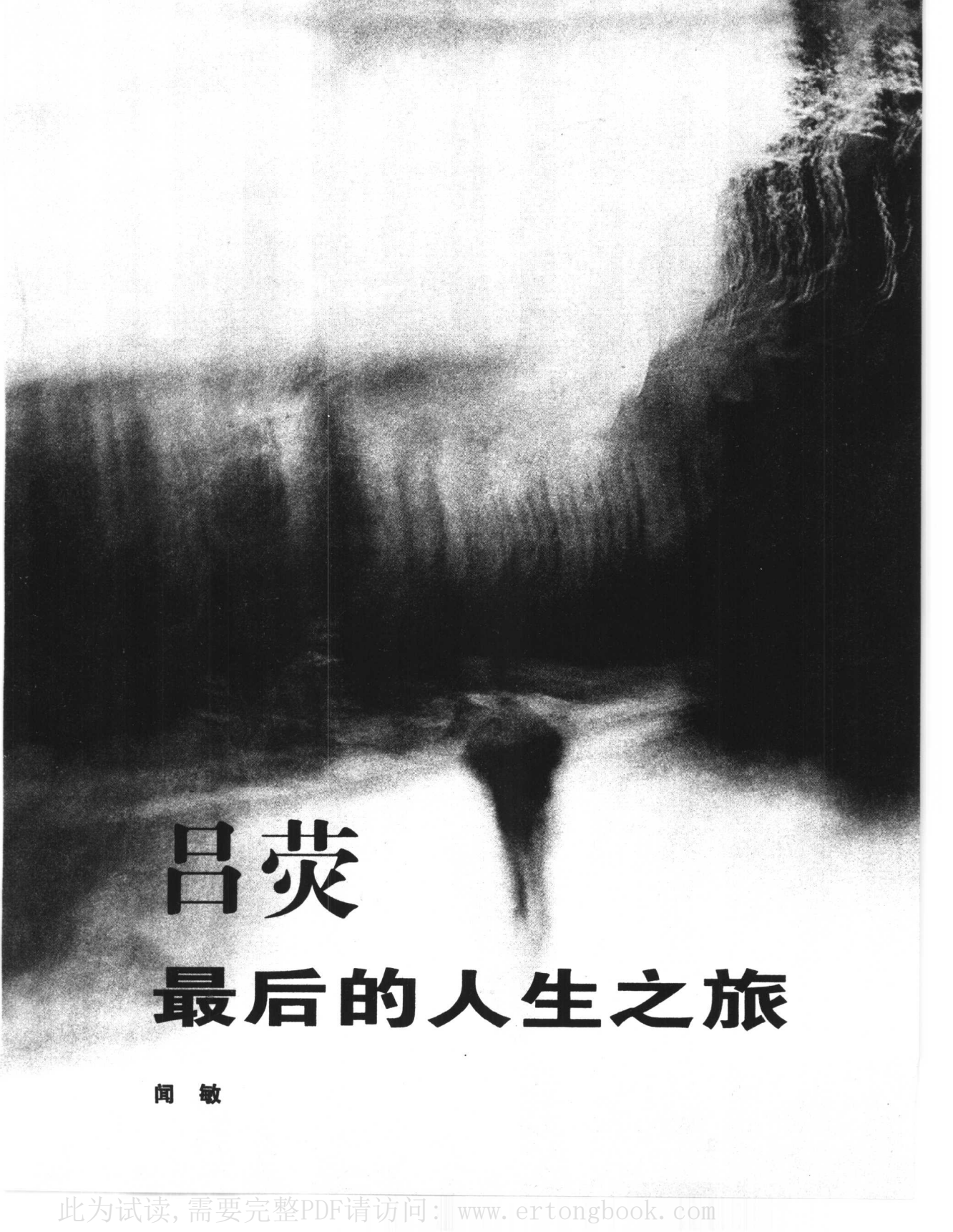
I. 记… II. ①林… ②章… III. 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2526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编辑室(010)62005034-220/62379038
 发行部(010)62005042/62005049
印 刷: 北京市忠信诚胶印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10 千字
印 张: 14.25
印 数: 1~10334 册
定 价: 23.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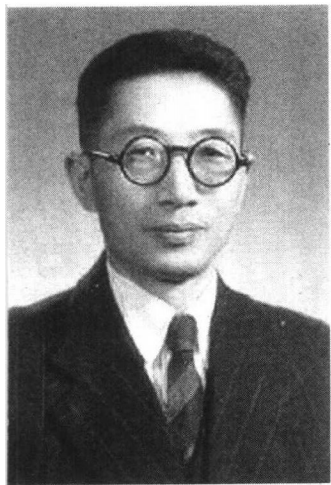
- 1 吕莛最后的人生之旅 / 闻 敏
12 心祭 / 黄伟经
- 20 文艺宣传队 / 刘嘉陵
32 监狱中的日常生活 / 徐 晓
- 52 荒弃之城 / 筱 敏
- 56 岁月不再 / 黄一鸾
64 姥姥 / 李 静
74 和陌生人有关(四篇) / 周佩红
- 86 记忆或遗忘 / 林贤治
- 92 人名与时尚 / 晓 白
98 战争游戏(外一篇) / 萧春雷
- 102 远去的情怀 / 郝一星
- 110 往事烟云 / [俄]瓦·格拉西莫娃 王 永译
146 在 1954 年 6 月的日子里 /
[俄]科·泽林斯基 李莉译
- 176 安娜·阿赫玛托娃：一个回忆 /
[英]以赛亚·伯林 马海甸译
- 193 永在的回忆 /
[俄]叶·康·利夫希茨 马海甸译
- 201 伽玛，历史的奴隶 /
[波兰]米沃什 叶远厚译



吕荧

最后的人生之旅

闻 敏



六十年代的吕荧

四、五十年代卓有成就的文学翻译家、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家、美学家吕荧(原名何结, 1915, 农历 10, 19—1969, 3, 5)离开我们已经三十二年了。本文所及, 主要是他从 1955 年夏至 1969 年春这十余年间所经历的一些事。

1

1955 年 5 月 25 日, 在北京东城东总部胡同新闻总署礼堂, 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为“讨论胡风集团反革命活动问题”曾举行联席扩大会议。会议主持者, 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首先从“请依法处理胡风”为题致开幕词。接着, 中国作协秘书长陈白尘报告说: 中国文联与中国作协近期陆续收到首都与全国各地文艺界两千余人签名的 69 封来信, 信中一致要求“把胡风从革命阵营里清除出去, 并彻底揭露这一集团的全部阴谋活动”。七百余名与会者报以掌声并举手通过了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协会员、撤销其所担任的中国作协理事和《人民文学》编委的职务、撤销其所担任的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并且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撤销其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 对其反革命罪行进行必要处理等五项决议。之后, 事先布置好的发言人鱼贯上台表示竭诚拥护……就在这时, 出人意料地, 一位身材瘦长、穿着与 5 月下旬北京的气温很不相宜的厚厚的中山装的人向主席台递条子要求讲话。人们认出这是吕荧。被允许后, 他拿了一张讲稿走到麦克风前, 以平静的语调说: “胡风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而是思想理论问题。胡风不是反革命……”氛围凛冽的会场顿时为之哗然。特别是在一位颇有资历和影响的理论界人士站出来, 冲吕荧挥拳头, 让他“交代与胡风的关系”之后, 那愤怒的嘘声、口号声更连成一片了。体弱多病又习惯于独自一人伏案工作的吕荧哪里经受过这样的阵势? 他并没有慌乱、改口, 只是面色灰白、汗涔涔地站在那儿, 似乎还想把话说完, 但变得结结巴巴的了。这时, 郭沫若欠起身, 拖着他那特有的长腔, 要吕荧立即停止发言。吕荧这才转身向主席台鞠了一躬, 缓

缓回到自己的座位。会议便又按部就班地进行了下去……就笔者迄今为止的见闻，“胡风案”发生之后，全国范围内，敢于如此公开为胡风申辩的，恐怕仅止吕荧一例，而吕荧为之所付的代价之惨重，也是有目共睹的了。

事隔半月，1955年6月10日，《人民日报》公布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以下简称《第三批材料》）中收录了吕荧1950年6月21日自大连寄给胡风的信中的一句话：

关于守梅兄的文字，都看到了，我觉得守梅兄该写一篇“歪曲和伪造不是批评”来答复的。（自然，引文是错了）

《第三批材料》中有关的注释这样写道：

[守梅兄的文字]守梅即阿垅，“文字”指阿垅写给《人民日报》的一封信。1950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陈涌、史笃同志批评他的文章后，阿垅写一封信承认他歪曲引用马克思著作的译文的错误。胡风集团分子吕荧在这封信里向胡风献策，认为“歪曲和伪造”的不是阿垅而是党报。吕荧鼓动阿垅向党报反攻，并且连文章的题目都代拟好了。在最近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的有七百多人到会的联席扩大会议讨论开除胡风的会籍和撤销他的一切职务的时候，站起来替胡风辩护的就是这个吕荧。

此外，《第三批材料》的“编者按”末尾，还写有这样的话：

当本报公布了第一、二批揭露材料之后，还有一些人在说：胡风集团不过是文化界少数野心分子的一个小集团，他们不一定有什么反动政治背景。说这样话的人们，或者是因为在阶级本能上衷心地同情他们；或者是因为政治上嗅觉不灵，把事情想得太天真了；还有一部分则是暗藏的反动分子，或者就是胡风集团里面的人，例如北京的吕荧。

事实上，1955年5月16日，胡风夫妇已遭逮捕。此后半个多月内，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武汉等地，先后有13人以“胡风分子”的罪名失去了人身自由。吕荧之所以还平安无事，还能以自由之身前往出席5月25日的那次大会并获准登台发言，多半是由于胡乔木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威人士觉得吕荧人才难得，知道他终日埋头著译，与胡风等七月派文友纵然观点相近但却疏于交游的缘故。1954年3月吕荧加入中国

作协之后,当年秋,被《人民日报》聘为文艺部顾问,也是胡乔木积极建议的结果。然而,吕荧一旦引来烧身之火,被《第三批材料》点了名,并被直接冠以“胡风集团分子”的头衔,这么一来,即使胡乔木还想保护他,也无能为力了。《第三批材料》见报后的第九天,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公安部门对吕荧实行隔离审查。从此,吕荧踏上了他最后的人生苦旅。

2

吕荧与胡风间的友谊始于1937年初。当时,在上海主编《工作与学习丛刊》的胡风,收到一封从北平寄出的、署名“倪平”的青年的信和两篇文稿:《论在艺术方法上的鲁迅》和《田间与抒情诗》。“倪平”是吕荧最初的笔名。当时吕荧还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学生。信的开头这样写道:

当你接着这两篇东西的时候,因着这个陌生的名字和突兀的举动,你会感到惊讶吧?

你是不认识我的,也许还是第一次看见我的名字,不过你的论文对于我是十分熟悉的。你的深湛的文学修养使我感到一种亲切的印象,并且使我决定了这个突兀的举动。

这两篇东西寄给你,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无情的、严厉的批评,并且我相信,你是不至于使我失望的^[1]。

这是他们二人间交往的开始。胡风不愧为一位杰出的文艺活动家和文艺青年们的真挚而忠实的师友。他的确没有辜负吕荧的期望。寄来的两篇文章因《丛刊》遭禁而未能及时发表,但胡风阅后认真地提出了修改建议。吕荧后来将它们改写、扩充之后,又寄给了胡风。这两篇文章发表于1940年的《七月》上。《七月》除刊登了这两篇文章外,还先后发表了吕荧写于抗战初年的短篇小说和完成于抗战后期的著译数种。此外,吕荧最初的、也是具有代表性的文学评论集《人的花朵》,于1945年2月,作为“七月文丛之四”,由重庆大星出版社出版,编者是胡风。鉴于以上种种,吕荧在成长的过程中,对胡风一向怀有爱戴和感念之情。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思想理论上各持己见。比如吕荧在写于1946年5月的短论《艺术与政治》中,就曾严肃而率直地对胡风所倡导的“主观战斗精神”一说提出了批评。由此可见,1955年5月25日吕荧当众申明自己的看法,认为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完全可以展开批评与争议,但不应无端地把理论上的分歧上升为敌我间的矛盾,胡风不是反革命,等等。这里不会有

[1] 转引自梅志《人的花朵——漫忆吕荧》,载《传记文学》1987年4期。

任何技巧或策略的成份，而是与吕荧长期以来对胡风的认识和态度相一致的，不过是吕荧发自内心的大实话而已。

《第三批材料》所引用的吕荧1950年6月21日自大连致胡风信中关于阿垅反批评的建议的一句话，其事实的原委是：1950年3月阿垅经友人介绍开始在天津文协工作。他以饱满的热情接连写出了《论倾向性》和《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这两篇论文，分别发表在天津的《文艺学习》和上海的《起点》两种杂志上。今天来平心而论，这两篇文章里都闪烁着作者对文艺的真知灼见，比如，他认为现实社会中任何阶层的人物都有权利成为文艺作品中的人物，乃至主人公；再比如，他认为文艺作品的政治倾向寓于作品自身，因此，离开了艺术和艺术实践的社会效果，也就谈不上它的政治倾向性了。鉴于此，阿垅大胆地提出了“艺术即政治”这样一个在当时条件下容易招致误解和指责的口号。果然，阿垅不久便遭到了围攻。

3

1955年6月19日吕荧开始接受隔离审查的当天的情景，恰好被萧军给撞上了。吕荧与萧军是老朋友了。他们是1938年下半年在成都相识的。大约是1954年，吕荧用稿费在北京交道口附近土儿胡同买了一处房子。萧军陪他上街选购了几样家俱。那时，吕荧家中只有他一个人，他与妻子潘俊德已经于1953年正式分手。潘在天津一所中学教书，把他们的两个女儿——玲玲和美美都带走了。萧军常来看望吕荧，有时，作为一种消遣，他们一同去琉璃厂逛逛，看看古董、古书、古画什么的。

有一天，萧军照例又来到土儿胡同。敲敲门，开门的是位陌生人，进屋一看，吕荧坐在沙发上，身旁有人，不像是客人。吕荧的神色似乎很紧张，冲着萧军说：“你可以给我作证明，我是拥护毛主席、共产党的……”这时，那陌生人走了过来，对萧军说：“你知道不知道？他已经失去自由了！”萧军回说不知道。那人又问萧军的姓名、和吕荧的关系、找他干什么。萧军通报了姓名，说是朋友关系，找他一同上街逛小市儿。那人听后走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开来两部汽车。一位年龄稍大的人进屋，又把萧军盘问了一遍，然后说：“你可以走了，不要再来了！”萧军答道：“我不会再来了。”出门之前，萧军回头看了看吕荧，说：“好咧，有机会我会把你的情况告诉给朋友们的。”出了屋门，萧军看到院子有人把守，还在往进搬铺盖之类，看样子是想长期住下去。

过了一年多，1956年5月25日，吕荧恢复了人身自由。结论是：

经审查证明，吕荧没有参与胡风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经中央十人小组批准，于1956年5月25日，解除审查^[2]。

这一年吕荧四十一岁。

萧军曾回忆说：

总是在他失去自由的一年之后了，一天，他忽然到我家来了，说已经解除了看管，还说第一个就来看我。说起这一年多的日子，他告诉我：那些看守的人倒没怎么为难他，只是在屋里总有人看着，外出总有人跟着。

萧军感到此时吕荧的精神状态与以往有些不同^[3]。

自从吕荧被隔离，他就不再是《人民日报》的顾问了，审查解除后也未恢复。他仍旧还算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外高级翻译人员，按月领取生活补贴。他又开始伏案工作了。到1957年2月，他写完了美学论文《美是什么》，给了《人民日报》。十个月之后，1957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他的这篇论文时，加上了一篇简短的“编者按”，据说这是胡乔木撰写、经过毛泽东审订后见报的。这则按语的全文是：

本文作者在解放前和胡风有较密切的来往。当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揭露、引起全国人民声讨的时候，他对胡风的反革命面目依然没有认识，反而为胡风辩解，这是严重的错误。后来查明，作者和胡风反革命集团并无政治上的联系。他对自己过去历史上和思想上的错误，已经有所认识。我们欢迎他参加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

这一年，吕荧译的普列汉诺夫著《论西欧文学》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美学论文得以在《人民日报》上刊行，译著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还有那段“编者按”，尽管其中仍旧充斥着不实之词，但，在那样的年月里，大家都明白这种迹象都意味着一种公开平反。在京的和外地的吕荧的故友们都松了口气：这个太傻气、太不懂如何保护自己的人总算度过了一道险关！既然头顶的乌云已经消散，但愿从今以后他能平平安安地干自己的本行业务就好了！

其实，1957，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也是个凶

1939年胡风与夫人梅志及子女合影于重庆北碚



年。或许是由于吕荧惊魂甫定，再加上他早已处于边缘状态，所以，“大鸣大放”中幸而没有再为自己招来祸患。但是，“反右”的结果，身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一向默默地关注和保护着吕荧的冯雪峰却罹难了。吕荧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境遇每况愈下，按月领取生活补贴时难免不遭到人们的冷眼，更有甚者，他还一度被逐出了土儿胡同的宅院……

在“大跃进”的1958年，2月里，吕荧的文艺论文集《艺术的理解》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1959年8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吕荧一生中最后的一本论文集《美学书怀》。这年冬天，他带着翻译与写作的计划赴上海，不料，到达上海后因精神病的加剧被送进了广慈医院。

待到吕荧出院后返回北京、搬回土儿胡同旧宅时，已是1962年了。大概就是这段时间里，一天，吕荧到街角一家小铺买了点烙饼之类，双手捧着，正准备往回走，却遇见了出狱不久的梅志。梅志回忆说，那时，为了避免麻烦，路遇熟人她一般是不打招呼的，但吕荧当然例外。他们站在路边谈了几句。吕荧说起1955年5月25日那次会上的情形，说他当时“想纠正他们”，但是“他们”没让他把话讲完。梅志领他回到家中，对他说：“我看你的日子过得挺狼狈的呀！”吕荧笑笑，说：“是呵，狼狈，狼狈……”但他告诉梅志，他正准备再写一篇美学论文。梅志听了很高兴，鼓励他：“安安心心地写吧！”梅志留他吃晚饭，吕荧谢绝了，说：“等胡风兄回来再吃吧！到那时候，咱们一定要干杯、庆祝！”……^[4]

吕荧依旧在辛勤地耕耘，持续着美学问题的思考。这一年的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美学论文《关于“美”与“好”》。这是吕荧生前完成的最后一篇论文。

回到北京后，吕荧精神病的症状有增无减，体质也日渐衰弱。他素来不善于照料自己，到这时，他的生活变得更加杂乱无章了。听到这方面的传闻或目睹他的这种现状的他往昔的友人和学生们，都不禁黯然神伤，因为活跃在他们记忆里的，完全是另外一个充满着活力和魅力的吕荧呵！

在六十年代初，吕荧已经变成了一个精神恍惚和充满病态的人。有一段时间，他对发现和收藏中外古代名画家手迹产生了浓厚兴趣。可是，他那时的经济收入已经微乎其微了，加上这种要命的癖好，他几乎陷入了赤贫的境地。萧军说，“那时候，吕荧真像是生活在坟墓里似的。”一天，萧军去看他，见院子里的蒿草长得一人来高，屋子里的墙壁塌了一大块，椅子心不翼而飞了，光剩下空空的椅圈儿，没有炉灶，就地用几块砖拢着火，把屋子熏得黑黑的，床上只有一袭破旧的棉絮……^[5]

据牛汉回忆，有一次，已经是6月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料室，冯雪峰告诉他：“今天在街上见到吕荧了！……天这么热，他还是一身冬

[2] 见1979年5月31日公安部《关于吕荧同志被收容强劳问题的复查结论》。

[3] 以上引述的萧军的见闻与原话，均见笔者1984年访问萧军时谈话记录。

[4] 2001年5月笔者访问梅志谈话记录。

天的打扮，是不是缺钱换季了？”当天下午下了班，牛汉受冯雪峰之托，来到土儿胡同，见吕荧果然穿得厚厚的。牛汉转达了冯雪峰的问询，吕荧木然地嗫嚅着：“我……有钱用……我不热呵！……”牛汉进屋一看，简直破烂不堪，到处都被烟熏得乌黑，书架上的书所剩无几了，棕绷子上铺着薄薄的褥子，上面是个破棉花套……牛汉把冯雪峰家的地址告诉给吕荧，嘱他去看看雪峰。后来听冯雪峰说，吕荧真的去了，而且，从那次以后还常常去^[6]。

大致也是那段时间，吕荧有时也去看骆宾基和罗烽。在老朋友那里他打破了平日的沉默，但是，所说的也多半都是些逻辑紊乱的话^[7]。

据吕家乡的回忆，1964年春，他曾收到吕荧老师的一封挂号信。信是用毛笔写的，信封的下端写着“北京吕荧”四个杏子般的字。信中说，这些年来“乏善足陈”，想必吕家乡“在思想和学业上定有长进”……还开了详细的地址，希望吕家乡给他去信^[8]。

看来精神恍惚的吕荧在那孤寂、潦倒中还时而记起往昔的友人和学生。尽管像是生活在坟墓里，他的那颗心却仍旧渴望着人间的友谊和温情……

4

1966年那个不寻常的夏天来到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发表后不久，一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不知从何时起他住进了吕荧土儿胡同院内的厢房）在机关大楼贴出了一份大字报，题目是：“胡风反革命分子吕荧持刀行凶”。

后来听说是在一次口角中吕荧忍无可忍，才操起了一把刀。至于是水果刀或菜刀，没人说得清。

耐人寻味的倒是：这位“芳邻”究竟是出于怎样一种心机，去激恼一个精神不健全的、病弱的学者，并乘势将他逐出家门、置之于死地呢？听到过一种解释，可惜尚未得到证实。

5月底，北京市委下达文件，明令将社会上“各种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人”于三日内统统集中看管起来。

6月初，经公安部批准，吕荧被以“胡风反革命分子影响社会治安”为名，“收容强制劳动”。

在吕荧遭到拘捕的次日，牛汉等二人受命去土儿胡同收拾吕荧的东西。牛汉进屋后，眼前的景象比几年前更加凄凉、更加凌乱了。架上只剩下寥寥几本谁都不会要的书，几幅假画，其中一幅是吕荧当作“伦勃朗手迹”买来的圣像。几件破旧的衣物。床上是破棉花套，薄褥子下压着几张写满了字的稿纸，看样子像是一篇美学论文的开头……牛汉他们把这全部

[5]1984年笔者访问萧军时的谈话记录。

[6]1984年笔者访问牛汉时的谈话记录。

[7]八十年代笔者访问骆宾基、罗烽时的谈话记录。

[8]吕家乡：《吕荧先生琐记》，载《海鸥》1983年2期。

的家当装进一只旧网篮里，拎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专政办公室”。

吕荧被押送到距北京不很远的良乡，一个代号“北京市公安局 268”的地方。据说文化部系统这次被抓走的只有两人，吕荧是其中之一。名义上是去“集中学习”的，但，到那儿一看，周围却布满铁丝网、电网，并有武装警察看管。刚刚被押送去的人们经常被调换囚室，每个囚室的“队长”也时常更换。

从这时起，吕荧的身边有了一位年轻的、心地善良的难友。他的名字叫姜葆琛，也是政治犯，被捕前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学生。七十年代末，姜葆琛出狱，得到了彻底平反后，从事建筑设计，八十年代末因心脏病逝世。幸亏有姜葆琛的回忆，否则，对吕荧最后的遭遇我们将一无所知^[9]。

据姜葆琛的回忆，吕荧被送去劳改时行装极为简单：上身穿着一件女式背心、一件藏青色哔叽中山装，下身是一条土黄色长裤。还有件已经脏得发黑了的风雨衣。赤脚，穿着一双矮靰胶皮套鞋。三年，他没换洗过衣裳、没洗过澡。吕荧的铺盖只有一袭破烂的棉花套，到后来变成一团烂棉花，夜里拥着它聊以御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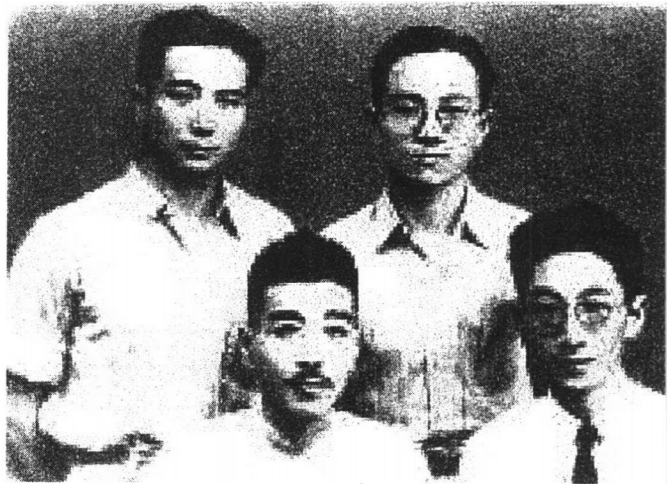
据姜葆琛回忆，刚到良乡“268”不久，一天，吕荧曾把他带去的那只不大的手提箱打开，取出一包又一包的蜡烛和一架旧的英文打字机。吕荧私下对姜葆琛透露：那手提箱夹层还藏有他尚未完成的美学论文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译稿呢！他告诉姜葆琛：之所以带这些东西来，是想继续工作的，“时间不能浪费”……

1966年秋，良乡“268”中大部分囚犯都被解往新疆了。吕荧、姜葆琛等人编入“老残队”，被送到天堂河农场。

据姜葆琛说，吕荧平日沉默寡言，从来不和“队长”对话。除了领饭时说声“谢谢”之外，对别人的问话一律回答“不晓得”。

在“268”，吕荧常常充当小会揪、大会批、低头挨斗的靶子；到天堂河农场后，他被宣布为“疯子”。从“队长”到一般歹徒，无不拿他开心。对于吕荧来说，任意的谩骂、凌辱、殴打，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有些小流氓听说吕荧带来不少蜡烛，就恶作剧地提出用馒头跟他换。吕荧的粮食定量最低，食堂又故意克扣少给，他吃不饱，所以同意交换。小流氓们故意欺侮他，开头用一个馒头换一支蜡烛，到后来，蜡烛贬值了，用一个馒头换一包蜡烛。吕荧的蜡烛很快就没有了。扒手偷走了吕荧



1947年，吕荧（前右）
兄弟四人合影于扬州

[9] 以下有关吕荧在劳改期间的诸多情况，均引自1984年笔者访问姜葆琛时的谈话记录和姜葆琛的《冬天的回忆》，载《人民日报》1983年5月27日。

的眼镜。“队长”也打吕荧的主意，借故把那架英文打字机拿走，说是替他“存”了起来……就这样，吕荧临时特地为自己打点的、可以用来继续工作的所有的一切，都被夺走了，只剩下一个“我要工作”的念头，还在苦苦地折磨着他……

又过了一段时间，吕荧、姜葆琛，还有一位年纪比吕荧还大的难友，被分派去看管猪仔。他们住在关猪用的低矮的棚子里。泥土地上垫上些谷草就是铺位了。一到秋雨连绵的时节，积水倒灌，他们就只能睡在泥泞里。那位年纪大的难友没多久就病死了。在那种环境里，死人是司空见惯的，拖出去，埋掉了事。

吕荧人在劳改农场，却关注着外面的形势。每天早上他都仔细收听“新闻和首都报纸摘要节目”。常见到他捧着一碗热开水，一面焐着手，站在广播喇叭下面听着。

相处久了，吕荧有时也和姜葆琛说几句心里话。他绝少说到自己，常念叨一些友人，关心他们在“文革”中的遭际。一次，姜葆琛获准进城看病，吕荧托他顺便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看看那里贴了什么大字报。姜葆琛带回来的小报，他总是等身边没别人时才取出来仔细地看。

有一回，吕荧说起1949年夏天离台湾、经香港北上的情况，流露出少有的兴奋，他对姜葆琛说：“大家不都是为新中国的胜利而奋斗的吗？……干革命，是不该计较什么的，更不能搞什么派别……”还有一次，说起五十年代初他在大连从事工人文艺运动的事，姜葆琛随口问到当时的待遇，吕荧严肃地瞥了他一眼，说：“讲什么‘待遇’，从来没考虑过！”……

有些时候，吕荧像孩子一般纯真。他很喜欢那群小猪，跟它们说话，跟它们玩。猪圈外面是苗圃，毗连着稻田，有一阵子，田畦上的茼蒿盛开着白色的花。吕荧被那片白花深深地打动了。他常拄着一根柳条棍走到花的跟前，久久地在那里徘徊，围着那片花转过来转过去，跟那花说着什么，一面转圈一面不住地喃喃着：“真美！真美呀！……”微风吹拂着他那身单薄的、烂成了条条缕缕的衣衫，他全然不觉。仿佛那洁白的生命给了他某种启示和力量似的。有一次，也是在他欣赏茼蒿花的时候，姜葆琛走到他的身边，他压低了嗓音，在姜葆琛耳边说：“一定要坚信：人民必胜！……”说完，又继续围着那片白花去转圈圈了。

姜葆琛记得吕荧还曾悄悄地对他说过这样两句话：

你年轻，一定要活着出去！……

想写，就要写自己最想写的！……

姜葆琛说，吕荧能说出这样一些话，都是在他少有的神志最清朗、最流动的时刻；更多的时候他是木讷的、恍惚的。

1968年10月，天堂河农场的囚犯们被分批地用戒备森严的囚车转移

到位于渤海之滨的北京市公安局清河农场。这是一处更加正规的劳改场所。到了那里之后，吕荧、姜葆琛被编入该场“585”分场的“老残队”。姜葆琛说，凡编到这个队里的，都是经过公安局的医生检查过、断定活不了多久的人。事实上也正是这样，“老残队”里经常有人突然一下就倒毙了。

在这所正规的劳改农场里，囚犯们十几个人共用一间囚室。室内除统铺外，只留下70公分宽的过道，仅容得囚犯们单列行进。据说这样可以避免发生殴斗。每间“囚室”的“队长”一律由武装警察担任。

到清河农场后，刑事犯们都可以领取一枚毛主席像章——表示他们是“可争取的”；而像吕荧、姜葆琛这样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囚犯却没有份儿，因为他们是需要“脱胎换骨”的。

日子变得加倍难熬了：没有开水供应；一日三餐总共只有九个像热水瓶塞子那么大的硬梆梆的窝头，还是用玉米叶和玉米秆磨成粉制做的。

1968年的冬天到了。想想看，那滨海的盐碱地河滩上的严冬，对一向病弱、畏寒的吕荧意味着什么？他身上那仅有的单薄的衣裤早已破损得难于蔽体了。还有那一团他拥着御寒的烂棉絮，姜葆琛告诉我们说，那里面藏着无以数计的虱子。它们无餍地吮吸着吕荧那几近枯竭的血液，搅得他整夜不得安宁……

然而，吕荧竟奇迹般地迎来了1969年的春天——他生命中最后的春天。

一天，姜葆琛听说吕荧快不行了，偷偷地跑去看他。他躺在阴湿的炕角，看样子，体重已不足50市斤。

北国早春，冰雪尚未消融。

五十四岁的吕荧，终于走完了他最后的、艰苦卓绝的人生之旅……

2001.9. 北京

心祭

——悼念老作家黄秋耘

黄伟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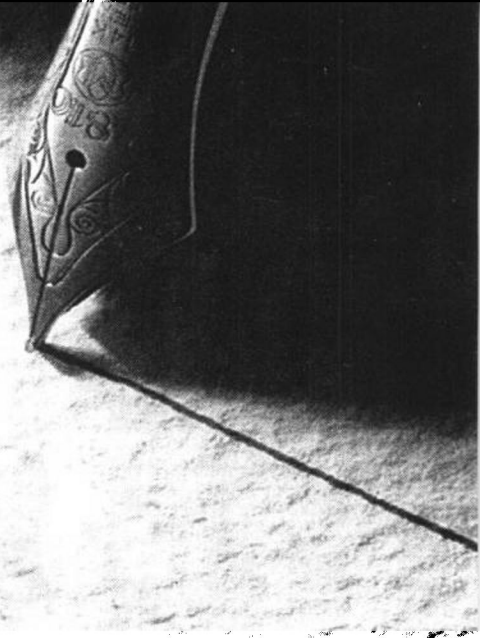
老作家黄秋耘走了，永远地走了。

那是2001年8月6日午夜，在广东省中医院，黄秋耘平静地去世，终年八十四岁。除了他的夫人蔡莹大姐及子女和有关医生护士，几乎没有惊动任何人。

他是五一节那天突然脑中风而送入医院抢救的。住院救治三个来月，家人按照他的意愿，除通知个别平日见面较多的朋友，没有告诉文坛中其他人。病逝后八十个小时，他的遗体火化。遵从他的遗嘱，只有家人为他送行，在他的遗体周围摆放一丛丛鲜花，依然没有烦扰亲朋好友，不发讣告，不举行告别仪式，也不放哀乐。惟有他至爱的儿子小鹰，在送他去火化前，播放了他生前最喜欢的一首歌曲《友谊地久天长》。一切都办得如此简朴、自然，很合黄秋耘的个性与风格。

这些天来，我脑子里总浮起黄秋耘的身影，他那对温和、明亮、锐利的眼睛，他侧着、低着头思索的神态，他内心有所忧虑、不屑、不满、痛苦或愤懑时微微抬头，目光直视我的严肃的表情，以及他那不急不高的话声。几十年来与他认识、交往的好些往事，就像影视镜头那样，一个接一个涌现于眼前。

虽然半个世纪前我已知道黄秋耘的名字，但同他相识，却是在非常岁



月的1966年。那年4月，他从北京中国作家协会调到广州已归中南局管的羊城晚报社，任编委兼理论部主任。当时我是羊城晚报驻北京特派记者。随后，“文革”爆发，黄秋耘很快靠边站。我却跳出来反对中南局派驻报社的工作组，于7月26日就自投罗网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即遭抄家、关押起来隔离审查。8月底，把我从隔离间放出，关进西瓜园（报社所在地）最早设立的“牛棚”，与散文作家秦牧（原羊城晚报副总编辑）和学者、《唐诗小札》作者刘逸生（原羊城晚报“晚会”副刊主编）一同关在一座楼房底层的一个单元房内，不准走出报社大门一步。此时，黄秋耘虽然尚未进牛棚，但他已被告知必须接受牛棚看管人员的监督，和报社已被“揪”出的牛鬼蛇神一起参加看“牛”队（即监管人员）指定的带有惩罚性质的劳动。几乎每天都见到黄秋耘和杨奇（原羊城晚报总编辑）、陆玉（原羊城晚报国际时事部主任）等还未关起来的报社“黑帮”，早上八点上班前来到关押我们的牛棚，向监管人员报到，听他们训话和接受当天分配的劳动任务：在报社大楼打扫垃圾，洗扫厕所，或到报社印刷厂搬东西、清理杂物。黄秋耘住得离报社较远，但见他总是准时甚至提前赶来报到，未见他迟到过，他也就未挨过监管人员的训斥。劳动时，他沉默寡言，不论干什么活都认真尽力。有一天他同我一块打扫报社编辑部楼下男

黄伟经，1932年生，广东梅县人。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文革前为《羊城晚报》驻京特派记者，曾任《随笔》杂志主编。翻译有屠格涅夫的《罗亭》、《贵族之家》、《父与子》等主要作品。